

## 头条评论

## “延迟退休”不能关起门来拿方案

张西流

养老体制改革在一片争议声中步步逼近。据了解,来自社科院、人大、清华、武大等院校的多个专家团队参与制定了多套改革备选方案,并要求在7月底提交有关部门讨论。(8月14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最近,有关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,与炎热的天气一样持续升温。普通劳动者担心延迟退休年龄,会成为“一刀切”式的硬性规定;而有关部门的说法,更是变幻莫测,让人无所适从;至于几家科研机构 and 高校拿出的“备选方案”,让有关部门“亮花了眼”。但是,无论最终怎么定夺,都不能由有关部门和专家关起门来拿方案。

中国目前施行的“男60周岁,女55周岁”的退休制度,是1953年制定的。这个政策是依据当时人均寿命和经济社会

发展状况制定的,对体力劳动者更适用,对科研工作者、医生、教师、企业高管等知识型人群,在年龄上“一刀切”,或采取男女有别,均显得不尽合理。

因此,延迟退休年龄可采取差别政策,对身体健康允许、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,推迟3至5年退休,其人力资本存量不因生理年龄老化而迅速衰退,他们如能晚几年退休,对社会的贡献大于给社会增加的负担,还能减轻社会的养老负担;而对长期从事高危、高污染以及劳动强度大,容易患职业病的劳动者,也给他们一定的弹性空间,允许他们提前退休。

再者,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,受教育时间也相对延长。一个具有本科学历的职业女性,走上工作岗位已接近25岁,到55岁退休,她服务社会的时间只有30

年。一些女性身体状况良好、工作经验丰富,但由于退休年龄的限制,只能告别工作岗位。这对职业女性和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损失。因此,女性退休年龄也可适当延迟。

然而,既然退休政策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,就应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,并遵从自愿的原则,将延迟退休年龄的选择权交给劳动者。因此,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,其退休年龄不能搞一刀切,应设置一个弹性规定,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身心状态,在一定年限中选择退休时间。总之,退休制度的建立,应体现男女平等的社会公平,应有利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,应更好地激励老有所为,让老年人在发挥余热、奉献社会的同时,生活得更充实、更有尊严。

## 世相杂谈

## 公交“哺乳间”给文明“哺乳”

李英锋

婴儿“吃饭”不定时,妈妈公交车上哺乳易出现尴尬场面,为解决这个问题,河南郑州公交三公司专门在公交车上设置了“哺乳间”。这个“哺乳间”占用一个老弱病残孕乘客专座,周围挂着香檳色的帘子,帘子可以随意拉合,旁边的窗户上贴着“哺乳间”三个大字。(8月14日《河南商报》)

尽管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媒体、维护妇女权益工作者不断发出呼吁,提出建议,民间舆论也热烈响应,但公共场所并未积极跟进,设置“私密哺乳”空间的寥寥。

另外,国家对公共场所的“私密哺乳”空间的设置和标准也缺乏统一的规范性要求或指导意见,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对提供“私密哺乳”服务重视程度不够,压力、动力不足。

郑州公交三公司在公交车上设置的这间小小的“哺乳间”告诉我们:相关场所设置育婴室、哺乳间等空间的成本和门槛并不高,只要管理者有诚意有爱心有责任感,肯动一下脑筋,给哺乳母亲和宝宝们提供一个隐秘或相对隐秘的空间并不难。这么做,对每个人都有益,毕竟,家家都会有哺乳母亲和宝宝;这么做,对于一些商家而言还是一份温情广告,能够拉近消费者的心,能够多赢得一份感动和信任;这么做,是一种文明的责任,是社会发展的潮流和方向。相关场所的管理者何乐而不为呢?

## 时事乱炖

## “体验看病”能否解决看病难

任小涛

今年7月,为践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,广东省卫生厅要求有条件的医疗卫生单位组织处级以上领导干部,以患者身份,从首道程序开始,看一次病或办一次事。昨日会上,省卫生厅处级以上干部代表纷纷对自己的体验过程进行了“吐槽”。(8月14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卫生部门官员需要专门“体验看病”,说到底还是缺乏共生机制。在一个公共空间中,所有人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,唯有共生,才能赢得社会整体利益的共赢。因为没有共生机制,拿着固定工资、不愁吃穿的执法者,不可能完全理解一车西瓜对于贩瓜者的意义;因为没有共生机制,兰考县的有些官员才一边对弃婴袖手旁观,一边又对爱心收养者横加指责。毋庸讳言,一个缺乏共生机制的社会,政府和民众的关系难免出现割裂和对立。

不与底层民众建立沟通渠道,便很



难获得对民间疾苦的感性认识;没有切身的焦灼感,便很难有改革的推动力。和个别官员“何不食肉糜”的冷漠和庸碌相比,实实在在的“体验看病”固然不错,但我们更希望官员都能破除特权思维,

少一点坐而论道,多一点恻隐之心,少一点名利考量,多一点民众立场,看病不走特殊渠道,不享受特殊待遇,和群众一起排队挂号、住普通病房,那解决“看病难”或许指日可待了。

## 热点冷评

## 谨防禁用“公款追星”流产

吴睿鹤

中宣部、财政部、文化部、审计署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,要求制止豪华铺张、提倡节俭办晚会。五部门明确,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,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聘请演艺人员,更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“明星”。(8月14日《京华时报》)

实际上,针对公款追星的“浊流”,早已引起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,并频频制定严厉措施。如今,五部委再次隆重出台禁用“公款追星”新政。笔者觉得,五部委禁用“公款追星”新政,虽有不少亮点,但仍有不少致命性硬伤,恐怕难以真正对禁止“公款追星”画上圆满句号。

要想禁用“公款追星”新政不再习惯性“流产”,首先,国家五部委要抓紧制定实施细则,由于现在出台的制度安排,仅勾勒出粗线条,“原则上”等软性词汇较多,缺乏操作性。比如,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聘请演艺人员。何谓“高价”,如何界定,实施细则最起码给指导性标准,“50万元,或100万元”是红线;又如,原则上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为旅游、历史文化、行政区划变更等节庆活动举办文艺晚会。何谓“原则上”,倘若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标准,恐很难将制度落到实处。

其次,问责不能缺位。此次公共政策提出,对违反本通知规定、耗资巨大、奢华

浪费的,要严肃处理。一句“严肃处理”,是党纪政纪,还是刑事处罚。这些都没有说清,类似问号,都需要一一拉直,拉平。

当然,治本之策,还应严格预算做起。按照现行财政预算制度,公款追星是无法进入正常财政预算的,然而,由于地方财政预算的乏力和监督机制的缺位,导致政府收支预算内有一块,预算外还有一块,相当一部分收支游荡在预算之外。这无疑给公众追星留下了生存的环境和土壤。既然公款追星的根子在财政预算上,我们不妨从强化财政预算入手,采取“财政问责”的方式,来破解这个久治不愈的顽疾。

## 非常道

“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,不是和宪政水火不容。”

——谈起近来的“社会主义与宪政”之争,著名法学家江平如是说。这是他近来思考得最多的问题,江平心目中的社会主义,是公平正义,和宪政代表的自由法治不可分割,并可互相借力,寻求最大公约数。

“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本身也是社会的重大财富,不让他们为如何自救所困扰,使其专力于创富,这是社会的急务。”

——王石关于企业家自救的话题,引起了舆论的密切关注,甚至被视为曾成杰案影响的余波。对此,昨日《南方都市报》社论表达了以上观点。



刷二维码,加星报  
微信,资讯就在身边。

朱忠保

地方领导没有远虑,只有近忧,只管眼前事、本届事。一些领导坦言:“上任借了钱搞工程、搞项目,有口碑也有政绩;本届政府绝不能勒紧裤腰带还债。”一些地方甚至流传着“干满一届是熊蛋,两年有效是水平,三年挪窝有能耐”。(8月14日人民网)

基层债务风险不断扩大,地方领导只管眼前事、本届事,究其原因,没有将“债务指标”纳入对基层官员的政绩考核,导致“债务递延”、“前任推后任”的“推诿心态”。有地方官员明确表示:上届借钱搞工程,本届绝不还债。不少专家学者认为,对地方政府一把手的考核,亟待制定相应的“债务指标”。

在干部升迁的问题上,上级以什么标准来考核官员,这对官员来说,是一个风向标。如果上级把GDP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,那么官员就会在GDP的增涨上大做文章,甚至不惜大肆毁坏环境,大搞竭泽而渔,只顾眼前的GDP,哪管明天的发展性。如果把“债务指标”也纳入官员考核范畴,那么官员就不敢大肆举债造政绩,必然要量入为出,量力而行。组织部门应在实践当中尽快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体系,以科学发展论英雄、以人民幸福为目标、以群众评价为标尺,才能选出综合素质优异的干部。

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强调,在选人用人标准上,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,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。可谓一语中的、振聋发聩,深得党心和民心,其意义就显得十分重大。